

涓流经济学的最后盛宴

蔡昉,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、研究员

面对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这一百年未遇的重大危机, 遗憾的是, 一些欧美国家并没有显示出人均收入水平高、科学技术发达和医疗卫生资源充裕的优势, 反倒因政府的应对不力造成重大生命、健康和民生的损失, 在本国和国际上遭到普遍的诟病。这些国家的应对措施及其效果或许仍有高下之分, 却明显与本国拥有的财力和资源并无紧密关系。虽然我们尚不能对问题出在哪里作出全面的评判, 但一个值得追根溯源的现象是, 在这些抗疫失利的国家, 涓流经济学根深蒂固地支配着政府和社会的发展理念, 并且分别孕育出新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政策。

正是这种笃信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体制, 既可以把资本及其所有者的无限获利能力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; 同时又能自然而然地使增长成果滴流到普通劳动者群体的理念, 在美国这样的高度发达国家孕育出民粹主义宏观经济政策。疫情全球大流行的现实充分暴露出这种经济理论的谬误, 亟待结合新的需求和新的实践打破理论瓶颈。

现实也表明, 虽然传统理论教条在应对当今世界重大挑战中已经屡遭失败, 涓流经济学却仍然上演着最后的盛宴。

涓流经济学的前世今生

涓流经济学天然地假设, 富裕群体获得的利益最终会通过涓流效应传递给贫困人群。涓流经济学的始作俑者不是亚当·斯密。诚然, 斯密确实在其《国富论》中讲到, “别人所需的物品, 他能予以充分供给; 他自身所需的, 别人亦能予以充分供给。于是, 社会各阶级普遍富裕”^①。然而, 结合斯密在早于《国富论》17年出版的《道德情操论》, 可以看到在其思想体系中, 其实并不存在社会各阶级自然而然变得“普遍富裕”这种涓流效应。在这个问题上, 斯密的

真实情操反映在包括《国富论》在内的诸多著述中。

例如, 全面理解斯密的思想可以发现, 他并没有把劳动与资本这两种要素等量齐观。在把工资与利润(或者说劳动和资本)放在一起讨论时,



①② 亚当·斯密著:《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》(上卷), 郭大力、王亚南译, 北京:商务印书馆, 1996年, 第11页, 第104页。

③ 艾玛·罗斯柴尔德:《经济情操论——亚当·斯密、孔多塞与启蒙运动》, 赵劲松、别曼译, 北京: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 2019年, 第112-113页。

④ Milton Friedman, *Capitalism and Freedom*, Chicago·London: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1962, pp. 161-162.

斯密给予劳动及其相关的贫困问题格外的关注, 原因就在于劳动要素和贫困问题分别承载和体现在人的身上。一方面, 在论述生产要素回报率趋于均等化的时候, 他正确地指出, 由于劳动要素与资本要素具有不同的性质, 因而劳动报酬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资本回报之间的差异。^②另一方面, 他指出贫穷劳动者虽然“支撑着全社会的框架”, 却仅仅获得十分微薄的工资, 因而暗示着政府实施济贫和再分配政策的必要性。^③

从经济学说史和经济政策渊源上来说, 米尔顿·弗里德曼才是涓流经济学之父。他倡导的是自由市场社会合理的收入分配伦理原则, 即让每个人都得到利用自有工具所生产的物品。于是, 国家的作用仅限于界定和执行产权^④, 即维持社会中每个人能够使用自有工具这种既定格局。

然而, 托马斯·皮凯蒂的著名公式

$r > g$ 揭示，资本收益增长始终快于经济增长（从而快于劳动报酬增长），并且已经被长期的历史数据所证明。因此，如果没有必要的社会再分配，每个人依靠自己的生产要素所能得到的物品，必然是不均等的，劳动要素的所有者与资本要素的所有者所能获得的报酬之间，最终必定产生天壤之别。

美国总统罗纳德·里根是最著名也是最彻底的涓流经济学实践者，其在任期内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原理转化为政策，推动了大规模的减税。1/4 个世纪之后，唐纳德·特朗普总统再一次将其发扬光大，在美国社会陷入贫富分化的情况下，竟然实施了“让富人获益、由穷人埋单”的减税政策。颇具象征意义的是，2019 年，特朗普为经济学家阿瑟·拉弗（Arthur Laffer）颁发了总统自由奖章。这位以“拉弗曲线”著称的供给学派代表人物，当年曾为里根所仰仗，如今再次风光，恰好说明了涓流经济学的代际传承。

在当今的美国，涓流经济学与宏观经济民粹主义是配合运用的。诸如减税这样的新自由主义政策，即便产生一定的做大蛋糕效果，却丝毫无助于解决积重难返的蛋糕分配不均问题。事实证明，这种政策倾向具有自我强化，影响范围逐步扩大，乃至无所不用其极的性质。同时，也会在突发的极端事件中遭遇更为严重的破产。

在疫情全球大流行过程中，美国总统和联邦政府在防疫问题上的不当举措，不仅使国家遭受重大生命损失，还爆发了全国性的社会动荡。“符合”其逻辑的选项进而是，扩大并利用而不是试图弥合社会的分裂，并且把民粹主义转化为单边主义，同他国展开贸易战、

采取遏制手段，从国际组织和一系列多边主义机制“退群”，乃至推动逆全球化过程。

曲线背后：大流行及其经济冲击

一如既往，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都在猜想，疫情之后各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会以何种路径复苏，并且用英文大写字母来描述可能的复苏轨迹。

迄今为止，被用来描述不同情形的字母包括：V 字形，指经济急剧衰退之后可以迅速复苏；U 字形，指经济衰退之后的经济复苏需要一定的时间；L 字形，指经济复苏的时间远比人们希望得更久；W 字形，指经济复苏呈现起伏和不确定的趋势。此外，也有更为悲观的预期，如认为经济衰退将呈 I 字形，即看不到复苏的希望，以及更为普遍接受的预期，即耐克徽标的钩状，虽然经济衰退后恢复起来需时较长，但是终究呈现出复苏的趋势。

不过，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趋势尚未明朗之前，任何判断都充满着猜想的成分。对于这一次全球大流行造成的经济冲击以及复苏前景，归根结底要看流行病学曲线的变化。新增确诊人数每日在时间轴上的展现，有助于中国认识疫情的走向，防控疫情应有的政策理念和应对经济冲击的措施，以及经济复苏的可能轨迹。这与 2003 年我们在应对非典型性肺炎（SARS）时的经验密切相关，当时经济复苏轨迹就是以镜像的方式对流行病学曲线做出反射。^①

更为重要的是，认识流行病学曲线也有助于破除涓流经济学。流行病学曲线背后都是生命。一些国家领导人无视科学，任由流行病学曲线攀升。一些国家领导人希望在拉平曲线的情况下，获得群体免疫从而在控制疫情上一劳永逸。其看上去应用了统计学的方法，似乎是科学和严肃的，殊不知统计学归根结底是“大数定律”，在新冠肺炎死亡率既定的情况下，无论流行病学曲线是平坦的还是陡峭的，每一步上升都意味着生命和健康的损失。

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·撒切尔也是涓流经济学的信仰者，她的名言“没有社会这种东西，有的只是个体”，看似尊重了个体的自由选择权，却否定了社会

① 参见蔡昉主编：《“大流行”经济学——应对疫情冲击与恢复经济增长》“绪论”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20 年。

对个体的责任。事实表明，社会中的不同群体和个人，在致命的疫情面前既不具有充分的信息，也不是完全平等的。防范疾病的任何措施，包括检测、免疫和治疗的手段，都不会均等地滴流到每一个人身上。在疫情造成的失业和就业不足、收入降低以及生计威胁等面前，首当其冲的通常是穷人和脆弱群体。我们完全可以设想，即便疫情过后，最难以回到就业岗位、重拾基本生计的同样是这些群体。

疫情演变得日益严峻化以来，美国政府也并非什么都没做。在宏观经济政策上，美国政府无视一直以来标榜的中央银行独立性，对美联储施加巨大的政治压力，史无前例地实施了货币的大放水。在疫情从供给和需求两侧同时冲击实体经济的情况下，过分充裕的流动性并不只是具有安慰剂的作用，而是以数万亿美元的力度刺激资本市场，加上其他措施给富人以好处，让处于财富链顶端的人群在疫情中赚得盆满钵满。就连特朗普本人也在推特上声称，美国应该乐见负利率这样的“大礼包”（GIFT）。与此同时，经济的停摆造成高失业率，每一个百分点的背后都意味着普通劳动者的生计危机。在涓流经济学操办最后盛宴的同时，也上演着九天九地的悲剧。

以人民为中心：压力测试催生新理念与新机制

继《21世纪资本论》之后，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一部题为《资本与意识形态》的新著，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之时出版，可谓正逢其时。他把不平等现象作为不具有合法性的“意识形态”问题，不顾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不敢违逆的“政治正确性”，即做大蛋糕所必要的激励，提出了“革命性”的再分配主张——高达90%的累进税率。^①

这种“侵犯”私人财产权利的动议自然不能为西方社会所接受，大多数经济学家同行也不赞同他的政策方案。^②同时，就中国的语境而言，皮凯蒂的方案也未必具有直接的针对性。但是，这的确是一个从理论上清算涓流经济学的大好时机。我们不妨把皮凯蒂所说的“意识形态”广义地理解为关于平等与不平等的“社会共识”或者“理念”，把他提出的激进政策

主张转化为必须严肃对待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可行方案。

历史经验反复表明，某些突发性的危机事件，常常会把一些趋势性的缓变一下子催生为急变，这在经济或社会难以适应的条件下，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巨大的破坏性。从另一个角度看，如果以诸如此类的危机事件作为一种重大转变的压力测试，则可以未雨绸缪、化危为机，从理念上、政策上和实践中转向更可持续的发展路径。

新冠肺炎大流行，就是对于社会公平正义和收入分配问题的一次压力测试。特别是诸如气候变化和新一轮技术革命将对社会公平带来的冲击，究竟会达到何种程度，表现为怎样的形式，如何才能政策上和体制上进行有效的调整，新冠肺炎疫情诚为一次难得的预演。关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关于政府的必要职责的新理念，或许正需要深化讨论并且能够由此诞生。

与涓流经济学及其实践遭遇巨大失败的情形相反，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发展思想自始至终贯穿于中国抗击疫情和恢复经济的进程中，在重大决策及其政策措施的制定中居统领的地位。

与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，中国本着生命至上的理念和尽力而为的原则，举全国之力支援疫情中心，在不同阶段分别进行全面隔离、全民免费收治、全民检测，以及分阶段全面复工复产的措施，较为成功地控制了疫情的流行并逐步进入经济复苏轨道。

这一危机应对的实践探索及其成功经验，也标志着政府基本公共品的供给理念日渐成熟，不仅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，而且有助于形成在各种风险挑战中托底民生的新机制。

① Thomas Piketty, *Capital and Ideology*, Cambridge, MA, U.S.A., and London, U.K., Publisher Belknap Press, 2020.

② Arvind Subramanian, *After Capital: A Radical Agenda to Tame Inequality*, *Foreign Affairs*, Vol. 99, No. 4, 2020, pp. 165-170.